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研究（1949—1966）

——基于对《历史研究》的考察

杨凤城 付吉佐

【摘要】新中国“前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经历了“百家争鸣”的初步繁荣、“史学革命”的实践受挫、“阶级分析”的僵化困顿三个发展阶段。作为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最权威刊物，《历史研究》见证了这一历程。对“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研究、评价，关涉到当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因此，不能作简单的是非、成败评判，而应挖掘更多微观史料，通过实证研究丰富对“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认识，同时摒弃所谓“教条化”“政治化”的标签概括，区分“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影射史学的不同性质，科学认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历史研究》；“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微观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0）06-0043-08

作者简介：杨凤城，河北黄骅人，（北京 100872）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付吉佐，山东青岛人，（北京 100872）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17ADJ005）

当前，学界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围绕某一史学事件，如“五朵金花”“厚今薄古”等问题展开深入具体研究^①；二是从宏观层面综述“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②。前者丰富了独立史学事件的历史面貌，但由于重视个案，未能展现“十七年”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后者从纵贯性角度概括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但也存在“宏观分析的多，微观研究的少；理论评价的多，实证研究的少”^③的缺憾。鉴于此，本文试图做出补充研究：择取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历史研究》杂志为对象^④，从其发展过程中，“以小见大”，呈现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经“百家争鸣”的初步繁荣、“史学革命”的实践受挫、“唯阶级分析”的僵化困顿三个发展阶段，既关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纵贯性，又以微观视角、充足史料作辩证的实证研究。

① 例如，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储著武《“厚今薄古”：1958年历史学大跃进》，《安徽史学》2017年第1期。

② 例如，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蒋大椿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发展整体呈现“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斗争的特点。胡尚元的《建国后17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杜学霞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批判研究》则详细阐释了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大批判”的情况。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等则从更全面的角度描绘了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概况。

③ 黄广友《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史学”研究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④ 关于以《历史研究》为切入角度的研究，虽然学界早已有之，如山东大学盖志芳2010年博士论文《〈历史研究〉（1954—1966）研究》，以及台湾学者张哲郎、何启明主持的国科会计划成果报告《四十年来大陆史学研究评估——以〈历史研究〉杂志为中心的探讨》等，但这些研究或倾向史学理论的文本分析，或着重专题的研究评估，均与本文研究旨趣不同。

一、“百家争鸣”指导下的初步繁荣

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边缘位置、主要服务于“革命战争”相比，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中心，面临着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并服务现实的重要任务。这推动了《历史研究》杂志的创刊。

《历史研究》创刊之前，国内已有许多史学研究专门刊物，如《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文史哲》及《光明日报》之《史学》（双周刊）等。但囿于这些期刊杂志本身的局限性，它们还不能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代表。1953年，向达撰文指出史学界存在的“缺点”之一，就是“没有一种比较全面的历史科学刊物”，而且“领导不够强，不够明确”，“这几年来的历史科学工作是在无组织无领导或者名有而实无中过日子的”。向达指出的“缺点”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立足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也存在着相关性，如向达所说的“无组织、无领导”，“其不能出版全面性的刊物，乃是势所必至”^①。

以上问题的解决在1953年提上日程。是年秋，中共中央成立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党内机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并决定出版刊物《历史研究》杂志，由郭沫若作刊物召集人、组织编委会。最重要的是，毛泽东亲自为刊物确定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②。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不仅为《历史研究》杂志，更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原则。

《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成员有郭沫若、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晗、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共18人。从“几乎代表了我国全国第一流卓越的史学家”^③的编委会阵容，可以看出《历史研究》的学术权威性。成员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居多数，以保证“宣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办刊宗旨；也有以公开宣称“不宗奉马列”的陈寅恪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编委成员的组成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导的史学研究体系的多样性。

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出版第1期，并发表郭沫若撰写的发刊词。在发刊词中，郭沫若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考据或实证学派的包容态度，指出“我们并不想在目前就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假使一时还得出‘理论性的结论’，只要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甚至只要能够提供出‘详细的材料’或新出的材料，也是我们所一律欢迎的”，并呼吁“凡是抱着诚恳的态度、有心认真学习和研究的朋友们都来参加这项工作吧”^④，表达以《历史研究》为典范、带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期望。

《历史研究》创刊之初的几年确如“百家争鸣”方针所指导和郭沫若所倡导的那样。一方面，在文章主题上，既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文章，也有大量考据文章。如《历史研究》第1期共刊发7篇文章，其中5篇为史料考据文章，比重不可谓不大。另一方面，在作者教育背景上，既有如陈寅恪等兼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师学者，也有仅受过几年私塾教育的刘坦、高小毕业的江地为代表的“无学历”的史学家。这种发表文章不论出身、学派，一律平等对待的研究风气，表现马克思主义史学“海纳百川”“不拘一格”的包容性。

这一时期，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学界还通过“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广泛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阐释中国历史和现实，建构起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体系。所谓“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这五个问题。古史分期问题，

① 方回（向达）：《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光明日报》1953年10月3日。

②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8—169页。

③ 胡厚宣：《学习〈历史研究〉注意质量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④ 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由郭沫若提出殷代是奴隶社会而引发。在《历史研究》推动下^①，该问题的讨论进入高潮，形成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等“众说纷纭”的局面。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由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一文引起。该文首倡“皇族所有制”即国有制说，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至1965年，发表约150篇讨论文章^②。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由讨论《红楼梦》社会历史背景而引发，《历史研究》发表王明伦、黎澍、韩大成、杜真、尚钺、孙文良、邓拓、从翰香等作者十多篇文章，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发展程度及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农民战争问题，也是《历史研究》刊发论文所用篇幅较多的主题，发表了叶孝信、戎笙、侯外庐、白寿彝、郑昌淦、戚立煌、侯外庐、孙祚民、王崇武、贺昌群、胡如雷等人几十篇文章，基本涵盖农民战争问题研究的全部内容。汉民族形成问题，缘于范文澜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认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这一观点揭开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应该说，对“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成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初步繁荣的重要标志。

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思潮的引进，有人试图通过质疑和诟病“五朵金花”问题，来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五朵金花”问题的研究：首先，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对“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认识阐释中国历史和现实、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一次初步但深入的尝试。而且，学者们为论证相关结论所作的大量研究考证，促进了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其次，它活跃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氛围。虽然学者对这些问题观点不同，甚至作指名道姓的批判，但大家不以为意。如当时年轻学者金冲及写文章投稿，出于尊敬，他在文章中有“胡绳同志是我尊敬的前辈”几个字，《历史研究》在发表文章时却删去了，“给予了‘牛犊’和‘虎’平等言说的权利”。李埏也回忆说，他在看到这种“百家争鸣”的氛围后，“于是我也想写点东西”^③。这种活跃的学术氛围以及由这些问题引发的讨论，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后，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内涵和研究范式。如苏联学者依据斯大林的民族问题理论认为中国民族“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范文澜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不同于苏联学者的观点。又如，孙守任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就反对简单套用苏联的分期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这些都体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进行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正如翦伯赞所指出的，“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出的花朵，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来”，对这五个问题的讨论“并没有错，因为他们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④。因此，我们必须辩证看待“五朵金花”问题，既要认识到由于时代条件和学者理论水平的限制，对问题的讨论存在着缺点，但也不能否认对这五个问题的讨论“普及了表现为‘社会发展史’的唯物史观”^⑤。

总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虽然曾受“胡适批判”和“反右”运动等影响经历过曲折，但总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表现出蓬勃生机。以《历史研究》为例，其活跃的学术氛围引发学界和民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广泛关注，该杂志从1956年起改为月出一册，篇幅有时还有所增加。在销量上，《历史研究》创刊不足一年即突破两万册，甚至出现1957年上半年23000余册的纪录^⑥。这说明在“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走向繁荣。

① 据统计，1954 - 1957年，《历史研究》发表涉及该问题的文章35篇。

② 启循《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综述》，《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

③ 李妍《〈历史研究〉的片段历史》，《炎黄春秋》2007年第1期。

④ 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人民日报》1957年10月4日。

⑤ 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段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⑥ 转引自盖志芳《〈历史研究〉(1954 - 1966)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37页。

二、“史学革命”的实践受挫

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倡“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既要用科学的理论阐释中国历史，也要用科学的研究成果参与社会现实建设。虽然作为一次实践尝试，1958年开始的“史学革命”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受挫折，但也应看到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应用。因此，我们要吸取“史学革命”盲目跃进的历史教训，也要充分肯定“史学革命”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革命性”“实践性”特质。

“史学革命”始于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作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此时，正值“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动阶段。陈伯达的讲话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出基本评价，认为“还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的学风相当盛”；第二，提出学术要为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服务，“我们的学术界不要总是面对古代，背对现代和将来，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认识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面貌，认识中国全局的新面貌，认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新面貌；要对于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所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经验，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在各个方面，在哲学上、政治经济学上和历史科学上，作出新的概括，使中国的学术成就大大地高出过去中国一切历史时代的水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厚今薄古”；第三，提出“边干边学”的“方法论”^①。

客观地讲，这是一篇充满辩证思维的文章。讲话既指出八年来社会科学工作取得的成就，也指出存在的问题；既指出“现实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研究的主题”，也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不做考古的工作”，还认为“有了关于现代问题的科学知识，对于古代的问题就更容易了解了。我们懂得了现代，就会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去研究古代”，点明了研究古、今问题的辩证关系。而且陈伯达认为，厚今薄古“这是一个方法问题”，因而并没有将其提高到政治或学术指导思想层面。

目前学界在研究“厚今薄古”问题时，大多以新华社通讯稿、《人民日报》1958年3月11日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同志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为依据。殊不知，这篇新闻稿不仅压缩了陈伯达的讲话，而且对讲话作了曲解。如新闻稿写道“在谈到边干边学的时候，陈伯达批判了那些自高自大、翘起尾巴、瞧不起工人阶级、瞧不起劳动人民、瞧不起老干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这并非陈伯达原话所强调的重点，他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瞧不起工人、瞧不起劳动人民”的说法，更没有用“自高自大、翘起尾巴”的侮辱性词汇来形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反，陈伯达提出，“我们应该尊重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在科学的面前，采取傲慢态度，是不对的”。但由于对陈伯达讲话的压缩、曲解性报道，加之“大跃进”的盲目冲动赋予“厚今薄古”口号斗争意义，不仅使“今”与“古”截然相对，而且使“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演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史学革命”与“厚今薄古”的科学本意渐致丧失。

以《历史研究》发表范文澜等人的“研究历史应当厚今薄古”的笔谈为例。范文澜以“风气与条件”为主题，认为当时史学界的一般情况仍是“厚古薄今的风气弥漫”，提出改变这种风气的建议之一，就是“首先要研究中国现代史以及近代史”，而“古代史用少数人去研究就可以”；同时强调“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观点。此外，陈垣以“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须走的道路”，侯外庐以“古史领域中‘厚今薄古’方针的斗争意义”，吕振羽以“坚决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刘大年以“需要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等为题，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厚今薄古”的斗争意义和方法^②。

权威期刊发表权威学者的表态，无疑为以“厚今薄古”为主题的“史学革命”注入强大推动力，使“史学革命”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轨迹呈现出“大跃进”时代特有的色彩：第

① 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红旗》1959年第13期（附录《厚今薄古，边干边学》讲话原文）。

② 范文澜、陈垣、侯外庐、吕振羽、刘大年《研究历史应当厚今薄古》，《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一，对“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作简单片面的理解。如有人以“古”“今”论文发表频次为标准，将《历史研究》发表过的论文作统计，发现有关现代史的“平均每三期半才有一篇”，有关近代史的“平均每一期约有一篇”，而有关古代史的“平均每一期约有三篇半”，因此得出结论说，“《历史研究》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厚古薄今的倾向”^①。第二，提出不切实际的跃进计划。史学领域的跃进也参考经济领域的跃进，表现为压缩研究时间、加大研究工作量等。以《历史研究》编辑部所在的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三所为例。一所指出，“一些主要工作任务的完成期限都从十年跃进为五年”。五年内一所的奋斗目标是：（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史学，建立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的完整的中国古代史的理论系统；（二）形成一支有一定数量的又红又专的科学研究队伍；（三）写出一批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古代史著作；（四）建立一套完整的经过科学分类的中国古代史史料的公共积累，等等。二所、三所亦不甘落后，同样提出宏大的跃进计划^②。第三，“拔白旗、插红旗”，展开史学大批判。如中山大学历史系专门成立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研究会来领导对陈寅恪等的批判，完成批判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论文36篇^③。《历史研究》也发表批判陈寅恪的文章，说“陈寅恪关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论著，贯穿着反动的唯心主义文化史观这一条白线”^④。这一时期《历史研究》也成为史学批判的舞台，从《批判吴枫的“隋唐五代史”》《“国史旧闻”应该批判》《“战国策派”反动史学观点批判》《批判钱穆的“国史大纲”》等可见一斑。

伴随“大跃进”的结束，“史学革命”并未取得如期成果。如1960年时，《历史研究》稿件数量锐减，甚至在没有声明的情况下将月刊再次改为双月刊，而且从内容到纸张印刷，质量均显著下降。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具体实践的受挫。

目前学界对以“厚今薄古”为口号的“史学革命”，评价不一。批判者认为，是陈伯达提出的“厚今薄古”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受挫。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事实上，当陈伯达提出“厚今薄古”后，他“就很担心有人会把‘厚今薄古’这个口号当成‘时髦’的空名词，把它当成一种概念的游戏而了事”^⑤。所以，一定意义上，史学界自身应承担更多责任，而不能归诸“厚今薄古”。而且，作为一种学术倡导，“厚今薄古”实无不妥之处。早在1951年，吴玉章就提出“要注重现实，着重研究近三十年的革命史”的意见^⑥。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也倡导研究现实、服务当下。因此，针对特定的“言必称三代”问题，提出“厚今薄古”的学术意见，客观讲有助于纠正史学研究方向、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因特殊年代的失误，而否定学术意义上的“厚今薄古”，更不能否定“史学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饱满热情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意义和“革命性”特质。当前学界存在一种讳言“厚今薄古”，甚至矫枉过正、倡导“回到乾嘉”的学术倾向，这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视。

三、“阶级分析”的僵化困顿

1961年，为纠正“史学革命”的失误，史学界掀起一股提倡“历史主义”的风潮。《历史研究》在该年初进行编制调整，黎澍任主编。为解决“稿荒”问题、提高文章质量，黎澍一方面将《历史研究》从月刊改为双月刊，另一方面以戊戌变法、巴黎公社、辛亥革命为主题组织三次学术研讨会。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开始恢复勃勃生机。这期间，《历史研究》发表的邓拓和范文澜的两篇文章极具代表性，推动了史学界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

① 《大字报集锦之“〈历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历史研究》1958年第9期。

② 历史一所情报小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工作五年跃进规划的制定》；郅家驹《跃进中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三所通讯小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跃进指标》，均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7期。

③ 李锦全《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情况》，《历史研究》1958年第10期。

④ 北京大学历史系《关于隋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58年第12期。

⑤ 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红旗》1959年第13期。

⑥ 吴玉章《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进步日报》1951年9月29日。

邓拓的《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61年第1期。文章阐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观及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文章指出，“我们的方针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提倡“言必由衷的实事求是的作风”，甚至提出要鉴别学术水平的高低，除了政治上的六条标准外，“历史学界还可以有自己的标准”。文章虽有“打旗号”的意思，但针对的是当时史学界“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甚至破坏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①。

范文澜的《反对放空炮》发表于同年《历史研究》第3期。文章特别强调踏踏实实进行史学研究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出“真正打得到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著作（论文或书籍）”。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具体指向的是当时史学界存在的所谓为保卫“党性原则”而斗争的空洞口号^②。

有了邓拓、范文澜等史学大家的提倡，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历史主义”学风再次兴起。如针对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存在的把“古代农民理想化、无产阶级化的倾向”，蔡美彪撰文指出，“必须对各个封建王朝的具体的统治制度，不同时期的具体的农民战争进行具体的研究”^③。同时，这一时期关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也再次活跃起来。

但随着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党的政策重新发生“左”的逆转，史学领域强调“阶级分析”的风气日盛，“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争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界探讨的主题。1963年《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张玉楼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一文，批判刘节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张玉楼认为，刘节的历史观是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资产阶级史观。他指出，阶级斗争理论“是观察全部阶级社会历史的指导思想”，阶级斗争理论“使历史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使社会历史的研究第一次成为科学”。这就强化了“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并突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间的对立，由此掀开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争的序幕。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争，主要聚焦于对两者内涵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对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以宁可为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统一而有差别的两个不同理论。宁可的主张体现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④一文中，主要表达了阶级观点是唯物论、历史主义是辩证法的观点，虽然也强调阶级观点，但同时指出在运用阶级观点时，“又始终应当以对事物的历史发展及其各种条件的具体分析为基础”。另一种以关锋、林聿时为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包含历史主义，实际上是用阶级观点消融历史主义，否认历史主义的独立存在价值。关锋、林聿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贯彻着或者说包含着历史主义”，“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甚至就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⑤。虽然双方观点不同，但还都本着“欢迎批评指正”的态度，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争论被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

但当戚本禹发表对李秀成的评价并得到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争论告一段落，“阶级分析”成为支配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怀着影射彭德怀的目的，文章断言“李秀成自述”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李秀成本人是一个丧失革命气节的叛徒^⑥。据当时编辑丁守和回忆，稿子寄来时，他虽觉得观点偏颇，但“讲了些道理”。于是连同罗尔纲的《关于我写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一起发表^⑦。该文发表后引起极大震动，许多学者都不赞同完全否定李秀成。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到文章后提出意见说，对农民革命英雄人物不能轻易否定，提议由刘大年写

① 丁守和《谔谔集》，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

② 同上，第213页。

③ 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④ 参见《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⑤ 关锋、林聿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⑥ 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启超、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⑦ 丁守和《谔谔集》，第233—234页。

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作为史学界基本意见, 仍由《历史研究》发表, 以作补救。可见, 此时学界对历史人物尤其是以李秀成为代表的重要人物的评价, 大多还是提倡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如周扬说李秀成是“历史人物, 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 翦伯赞也指出忠王“有缺点, 但不应苛求”, 并强调说“在历史科学中反对修正主义, 是反对用修正主义的荒谬观点来歪曲历史”^①。

然而, 不久之后形势发生逆转。江青将戚文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肯定这篇文章, 并作了“白纸黑字, 铁证如山, 晚节不忠, 不足为训”的批示。批示传出后, 影响到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相关部门发布通令, 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 不要发表^②。之后学界关于李秀成研究的文章, 几乎一边倒地变成讨伐、批判。

这场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争论, 可以看作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争在史学研究具体领域的体现。争论中对肯定李秀成观点的批判, 实际上变成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论争的结果是, 由于政治的介入, “唯阶级观点”取得胜利。此后, 当戚本禹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旗号, 提出“无产阶级的战士, 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 “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③, 将矛头指向以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以《历史研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时候, 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问题的学术讨论最终转向极端化的政治批判。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批判说,“《历史研究》从1961年第1期由一位新主编接手以来, 逐渐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史学领域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这个刊物, 在学术讨论的幌子下, 以显著的地位, 大量的篇幅”, “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文章, 大放毒草”^④。在这样的批判声中, 代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正确方向的《历史研究》出版至第3期后停刊。

不可否认, 以戚本禹为代表的政治文人将“革命”等同于“阶级斗争”, 又将阶级分析方法“唯一化”, 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陷入僵化困顿。但当前某些历史研究作品以此为借口, 淡化阶级分析方法, 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边缘化”, 在史学研究中“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 提出彻底“告别革命”的错误论调^⑤。对此,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批判“告别革命”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一方面吸取“唯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教训, 另一方面科学认识“革命”的深刻内涵——“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

四、小 结

如何研究评价“十七年”史学, 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和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发展前景”^⑥的重大问题。目前, 在对“十七年”史学发展的评价上, 存在两种对立观点: 一种认为这一阶段“以农民战争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⑦, 持大致否定态度; 另一种认为“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巨大成就, 成绩是主要的^⑧。从上文对《历史研究》的考察看, 新中国“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既有“百家争鸣”指导下的初步繁荣, 也有“史学革命”的实践受挫, 还有“唯阶级分析”的僵化困顿, 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因此, 上述两种评价不免存在着“纠缠于意气之争”“泛泛而论马克思主

① 徐庆全《翦伯赞的一封未刊信》,《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94—95页。

② 同上, 第95页。

③ 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

④ 史绍宾《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人民日报》1966年6月3日。

⑤ 王伟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学科创新体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⑥ 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

⑦ 德朋、洪源、苗家生《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日。

⑧ 如陈其泰《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成就》,《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义史学的成败得失”“满足于简单的是非判断”^①的问题。

当下学界对新中国“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研究，应“转向开掘资料，勾陈被遗忘被尘封的史实，致力于细致扎实的具体研究，用点滴积累、循序渐进的方式还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来面目”^②。同时，在深入的实证研究过程中应注意三点：

第一，不能用“教条化”“公式化”“政治化”等标签，简单概括甚至否定“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更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确立指导地位，就必然导致发展的僵化、停顿。如果秉持这种错误观点，就会得出“十七年中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也就早已过时或应宣布为非科学”的结论^③。当前学界出现绕过“十七年”史学、甚至绕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割裂自身学统、转而接续民国的学术倾向，就是这种错误观点的体现。

第二，“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影射史学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史学体系。总体而言，“十七年”史学发展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而“文革”的影射史学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截然对立的“帮派史学”，毫无“科学性”“革命性”可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第三，关于该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可否认，政治对史学运动和史学发展方向有重要的推动、指引作用。但运动开展起来后的发展过程，并非政治所可以完全左右和控制。如，针对“史学革命”中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的宁“左”勿右错误做法，毛泽东曾试图作出纠正，批示要“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④。广东省委也对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陈寅恪的做法点名批评，认为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掌握不稳，对知识分子采用简单压下去的办法”^⑤。但这些政治权力的介入和纠正，无法扭转局势的转向。因此，认为是政治主动介入、史学被动接受而导致史学发展的曲折，进而把责任完全推之于政治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责任编辑 平 川)

① 陈峰 《刘大年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断想》，《齐鲁学刊》2014年第6期。

② 同上。

③ 陈其泰 《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评价与唯物史观的价值》，《南开学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期。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4页。

⑤ 陆健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85页。